



夕阳

过生日

□王世新

四川人过生日吃寿面。小时候我每年过生日，母亲都要煮一碗面条（寿面），里面还要加一个油煎鸡蛋，端来我面前，随即说几句诸如长命百岁、消灾免难之类的祝福的话，然后，亲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下去。那片片甜蜜、温馨、幸福的情景，至今还时时浮现在我心中。长大了，参加了工作，天天忙于工作学习，过生日的事，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直到80岁那年，儿孙们才突然想起来给我和老伴过生日。

我和老伴的生日，前后相差一个月左右。每年，儿孙们都把我两人的生日合起来过。有时在家过，有时去外面馆子过，每次都热闹非凡。第一次是在家过的。那次，儿孙们买了鸡鸭鱼肉等很多东西，提前一天就来家里做好了准备。当天中午，儿孙们个个都拿了一份生日礼物，来到我和老伴面前，“我爹我妈生日快乐”“我爷我奶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，那毕恭毕敬的样子，逗得大家好笑。我和老伴站不是坐不是的，只是不停地点头：“好啦、好啦。”儿孙们一起动手，人多手快，下午5点多钟，一桌子香喷喷的“寿宴”就摆上了餐桌。大家兴高采烈，兴奋不已，直到晚上7点多才意犹未尽地勉强离席。

寿宴一结束，孙子就摆开蛋糕，点上蜡烛，叫我和老伴坐在蜡烛前面，并从蛋糕盒里拿出彩色纸片，做成两个桂冠，分别戴在我和老伴头上，叫我和老伴各在心里许个愿，然后，叫我和老伴吹蜡烛。这时，全家人都围上来唱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”，众人拍着手，热烈欢乐的气氛，在客厅里回荡。蜡烛吹完了，儿孙们就把蛋糕挑起来送到我和老伴嘴里，这时，大家又拿出手机，给我和老伴照相……我和老伴都不习惯这种场面，老伴嗔怪了一句：“你们从哪里学来这些怪名堂。”但为了大家高兴，就任凭大家摆布了。一直闹腾到晚上9点多钟儿孙们才各自回家。孙子出门时，悄悄地问他奶：“您许了个什么愿？”“我不相信那些名堂，我只希望我这身老毛病早点好转。”孙子笑笑：“一定会，您肯定会健康长寿。”“走啦走啦！路上开车小心点。”老伴心里乐滋滋的。

因为我和老伴都不习惯这些过场，从那以后，几乎每年我和老伴的生日，都去外面馆子过了。每次，儿孙们都给我们送了生日礼物，如我用的精致的手棍、我参加书法协会用的各种印章、老伴用的肩背热敷理疗袋等等。每次都充满了温馨、热烈的气氛，表现了无比的亲情和热情。我问老伴：“不开心？”老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：“你不要看现在开心，不听话的时候肚子都要给你气炸掉！”“你气哪样，我看你开心得觉都睡不着了！”

（作者原工作单位：云南铜业集团，87岁）

人生絮语

1958年大饥荒，父亲将我从小家乡接到他工作的师宗红旗农场。农场小学背靠宜乐后山，山上林深木茂。春天，我常常到山上去听蝉鸣鸟叫，嘴里唱着：“高高的兴安岭/一片大森林/森林中住着勇敢的鄂伦春/一呀一匹猎马/一呀一杆枪/翻山越岭巡逻打猎/护呀护山林……”在树丛中捉迷藏抓蝴蝶，听于振中伯伯讲抗美援朝的故事。

炎热的夏天，从场部食堂打到饭后，大家成群结队地边吃边向距学校半里开外的一个小水坝走去，放下饭碗，脱去衣服，一个个“扑通、扑通”地往水里跳，随后分成甲乙两伙打水战，人人手脚并用，搅得天昏地暗，往往“战”到精疲力尽，仍然难分胜负。临近下午上课，遂将饭碗沉入水底，上岸穿好衣服，夹起书包，望着学校呼啸而去。

下午放学又迫不及待地来到水边，用碎瓦片往水面上打水漂，比谁的瓦片漂得远，谁的瓦片溅出的波纹多。大家同时往水中扎猛子，岸上的人则大声数着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认真记录着潜水人的成绩，当最后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时，在一片喝彩声中，人们争着将其不断抛出水面。最后，各自捞出中午沉在水底的碗，勾肩搭背，套用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插曲的乐调，摇头晃脑地唱着：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/吃饭的时间已经来到/端起我心爱的土大碗/奔向那诱人的伙食堂/五分钱的饭菜三分的菜/还有一碗玻璃汤/哎嗨——冲啊……”在路人的诧异目光中，向食堂蜂拥而去。

峥嵘岁月

我出生在滇西小城下关，排行老大，家里还有两个兄弟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在家附近上小学，由于家庭人口较多，生活贫困，四年级时被迫辍学，小小年纪到一家面厂当学徒，做家务，学擀面，分担家里的困难，就这样干了两年。后来，父亲找到了一家单位，每月能拿到固定的工资，家里的生活有了改善，我又重新进学校上了五、六年级。

1955年，我小学毕业，和其他同学一起考进漾濞中学读初中，初中毕业后，学校又试办高中，我接着在漾濞中学读了高一。在这四年间，我每天刻苦学习，周日休息时便拿上一书本到河边，边洗澡边洗衣服，洗好后把衣服挂在树上或摊在石头上晒，自己找个阴凉处读书，待太阳西沉，穿上晒干的衣服才回学校。有一次，学校放暑假，没有钱买票乘车，几个同学约在一起步行回家。漾濞到下关有37公里，我们早上出发，中午稍作休息吃点干粮，喝点泉水，到太阳下山才走到下关。这期间付出的艰辛和汗水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初中毕业时，我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，靠帮人手工织毛衣艰难维持生活，家庭又陷入了困境。学校知道这个情况后，从高一一开始就发给我助学金，资助我完成学业。读高二、高三时，按学校的安排，集体转到下关中学，也就是现在的下关一中继续学习。这两年间，我利用假期上山砍柴，一些留在家用里，多砍一些就卖了换点钱，或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增加点收入，以减轻家里的负担，继续走在求学路上。当时虽然环境艰苦，生活贫困，但没

三代人的放学时光

□何磊

1987年，女儿上学了。师大附小与我家居住的昆北院仅一墙之隔，学校后门距我家不足百米，遂配一把厨房钥匙挂在女儿脖子上，嘱咐她每天放学自己回家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。完成作业后，女儿最大的乐趣就是捧着家里的微型半导体收音机，从“滴滴嗒-滴滴嗒”的中央电台少儿节目播前曲响起，在院子里一边游荡一边听，直到节目结束为止。逐渐长大后，女儿学着捅开蜂窝煤炉子，烧上一茶壶水，然后捡菜洗菜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。一天，我和妻子下班因事上街，很晚了才回到家，只见女儿系着围裙正低头在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着，妻子连忙要去动手，女儿不允，只见她一会儿浇油撒盐，一会儿添放作料，最后给全家每人盛了一碗，边吃边问：“我做的炒面好不好吃？”嚼着那略带咸味的炒面，我们连连点头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穷人的孩子能够早当家，我们心里真比喝了蜜水还要甜。

大约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天，女儿做完作业到同院一个小伙伴家去玩，这个小伙伴家住二楼过道顶端，过道门距家门有一段距离，距院子中心有点儿背。几个孩子玩得入迷忘了时间。我们做好饭菜，发现女儿与另一同事的孩子均未回家，前院后院呼喊寻遍不见踪影，我和那位同事走出院子，分头四处寻觅依然未果，正急得焦头烂额之际，孩子从同伴家回来了，面对家长的厉声斥责，两个垂头丧气的小学生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，这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唯一一次“安全事故”。

2017年秋外孙女上学，我辞去退休

后在一所民办高校做了八年的工作，汇入由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父母亲友组成的“小学生接送大军”洪流之中，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守候在外孙女教室外的过道里，等待接孩子回家。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不得入校门，各路家长佩戴口罩，在校门外列出一支更长的翘首以待的队伍。为方便接送，我们还专门为外孙女办了学生公交卡。孩子的书包比我上大学时每天带到教室的书还要重。为着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家庭会议一致决定：只要孩子在家，一律不开电视机。如此一来，外孙女与电视基本绝缘了；为防止孩子玩手机上瘾，对外孙女使用手机亦进行严格控制，为此，父女、母女之间，祖孙之间“冷战”“热战”不断。

外孙女离开学校回到家，除去吃饭、上卫生间，总是在不停地写、不停地算。为了达标学校的才艺要求，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外，又先后参加了英语、书法、绘画、舞蹈、琵琶等培训班，连同周末在内，每天晚上九点半以前很少能上床睡觉，个人支配的自由活动基本没有了。目前，外孙女能够弹出父母不会弹的琵琶曲，能够跳出父母不会跳的舞蹈，能够画出父母不会画的图画，如此成就，不能说是收获。然而一想到这一切都是用减少外孙女的睡眠、剥夺其放学后自由支配的种种童趣交换而来，得耶？失耶？喜耶？悲耶？还真让人一言难尽。

（作者原工作单位：云南师范大学，71岁）

漫漫求学路

□王经



有磨灭掉我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理想的追求、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从初中开始，我接触到了一些报刊杂志，十分羡慕那些写文章的记者，从那时起，我就立志将来也要成为一名记者，学校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1961年高中毕业，我考上了昆明师范学院，也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，高兴的同时又犯愁了，我连到昆明的路费都没有，怎么才能到昆明读大学。在这困难时刻，我有一位热心的同学雪中送炭。

这位小学时的同学，叫李文汉。他参加工作较早，在运输公司开大卡车。他听说我的情况后对我说：“王经，你别急，我想办法送你上昆明。”之后，他四处打听，找到了一车要拉上昆明的货物，为了方便送我到昆明，又向公司申请了这趟运输任务。就这样，我带上简单的行李，爬上李文汉开的大卡车，踏上了我求学路上重要的一步。60年代初，滇西交通

十分落后，下关到昆明的滇缅公路，山高路窄，弯急坡陡，路面坑洼不平，光是爬红岩坡就要好几个小时，路上吃住的钱都是李文汉帮付的，一路尘土，一路颠簸，三天后，终于到了昆明，一直把我送到大学报到。

进入大学后，我想当一名记者的愿望更加强烈，宿舍蚊帐里用别针别着好几张名记者的照片，睡觉前看上几眼，用来激励我不忘初心。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，主要课程有古代汉语、现代汉语、中外文学史等。我很珍惜上大学的时光，因为上课认真、笔记认真、作业认真，受到了学校的肯定，还当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。我也很感激这所学校，因为家庭困难，高考只报了师范学院一个志愿。师范学院的学费由国家负担，除了伙食外，还有助学金，每月发给零用钱，冬天还有棉衣棉被补助。这些补助除了买点生活用品外，大部分都用来买书，也不敢有什么娱乐活动。有段时间电影院放电影《红楼梦》上下集，5角钱一张票都舍不得买，生活十分艰苦。大学期间，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叫李万才，他也早早参加了工作，常和我书信往来，知道我的情况后，时不时会5元、10元地汇钱给我，资助我渡过难关。毕业前，学院安排我们到玉溪一中实习，我认真备课，精心整理教案，得到了任课老师的赞扬、学校的认可。在党、国家和学校的培养下，1965年我拿到了毕业证书，同时，被分配到了云南日报社工作，圆了儿时的梦想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报记者，开始了我最崭新的生活。

（作者原工作单位：云南日报社，81岁）